

忆卞之琳先生二三事

■孙琴安

早在80多年前,卞之琳与何其芳、李广田三位青年诗人合出了一本诗集《汉园集》,遂有“汉园三诗人”之称。后来李广田、何其芳二人相继去世,我曾对卞之琳开玩笑说:“汉园三诗人中,数您的寿命最长。”他笑了。没想到在新世纪将临之际,他也去世了,终年90岁。

以往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到卞先生家去,而所谈的又总是诗。每次去,卞先生几乎都是在案边写作或看书,屋里总是很安静。我知道卞之琳与何其芳都很注意诗的形式,曾一度探讨过新格律诗的问题,在译诗中也很注重格律,但我的观点与他很不相同。

记得30多年前有一次在卞先生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班门弄斧,在他面前大谈诗的形式和格律:“不论中外,人类格律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歌不可能永远是格律诗,20世纪实际上是以自由诗为主的时代,就是再提倡格律和新格律诗也没用。”为了自圆其说,我不断举例,竟然说了十几分钟。卞先生居然静坐着听我讲完,也不插话,而且听得非常认真。我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与他相左,便等他反驳。不料他听完了却点点头,说:“你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真的吗?”我一阵惊喜,又有点怀疑。“真的。”他又肯定地点头:“是有点道理的。”

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得。因为我知道卞之琳在学术观点上轻易不附和、不含糊,而今居然赞同一个年仅30多岁又名不见经传的后辈的意见,这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

有一次去北京,正逢国庆节前夕,住宿紧张,我和一位同事暂住北师大,需补办手续方可长住。情急之下,我冒昧地去找卞先生,他连忙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托我转给该校蓝棣之,在他的帮助下,总算安居了下来。几天后我去卞先生府上致函,又谈起了诗。当时他为了找一份有关诗的材料,在他的大写字桌上乱翻,我见桌上书籍纸张凌乱,怕他找不着,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就劝他别找了。没想到他一会儿就翻了出来,一边拿给我,一边指着杂乱的书桌笑着说:“我这是杂而不乱,自有条理,什么东西放何处,只有我知道。”

交谈时我说:“诗人臧云远也到延安去过,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您,说在延安时也曾碰到过您。”卞之琳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听后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这篇文章我没见过,如你方便,我倒想看一下。”回沪以后,我就把臧云远文章中有关卞之琳的内容复印了一份寄给了他。他接到后,在1991年6月23日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承费神复印寄来臧云远文有关一段,谢谢!我应约写的一小文已寄出,现对照臧文,似没有记得太错的地方。只是上了年纪,除非当时记有日记之类,回忆过去总不免有出入处,我已不大记得在延安见过臧了。说我“一身八路军打扮”,显然当时我刚从前方回

来,是在春夏时,还没有来得及换夏装。他说我“三二年、三三年在北大西斋穿蓝布大褂”,倒像是何其芳的样子,他住过西斋,后来方敬也住过那里,李广田和我住过东斋,我都不记得和臧在沙滩见面了,却记得1935年清明时节在日本东京和他见过一面。

你的文章,还未见北京有复印件寄来,但没有关系,等发表后再看吧,我相信没有什么可订正的地方。

有关他与臧云远见面的问题,说实话,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卞先生在信中作了这么一番追忆,其态度之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写毛泽东与作家交往的书,想起何其芳在文章中曾写过他与卞之琳、沙汀在延安同见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交谈的事,心想卞之琳还在世,延安可能只是他早年见过毛泽东的地方,也许他后来还在别处见过,便给他写了封信求证。卞先生在百忙中立

即给我回了封信,信中说:“近半年来,事繁心烦,时间精力,两都不济,案头来信山积,实在无法一一清理置答。三月十六日来信,因素厌事实以误传误,这次涉及的人物又非同一般,有关与我的微末接触,亟需澄清,特抽空答复几句。”

接着,他就以较长的篇幅,回忆了他见到毛泽东的几次情况。尽管他作了补充,但他在信的末尾,还是善意地劝我:

虽然我现在补充告诉你这些细节(多半是记不准的),我还是奉劝你不要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因为这些都无关紧要,也乏善可陈,我也不愿意藉此给自己脸上贴金,藉此招摇。说话、写文章,都要认真,随便不得,查对材料,更应有真凭实据,实事求是,你在研究所工作,当然理解,用不着我提醒。

当然,我还是谢谢你的好意。像这样奉劝我不要撰写毛泽

东与文化名人交往的前辈作家有好几位,他们或认为意义不大,或认为风险太大,很可能吃力不讨好,除卞之琳以外,臧克家、柯灵、冯至等似乎都有这个意思。但我顾不了这些忠告,总想为后人留有一些可资参考的有价值的历史真相,所以仍一意孤行,最后终于写成了一部82万字的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分上下两册出版,并寄给了卞之琳一套。他收到以后,在1994年3月24日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毛泽东与名人”早收到,谢谢。作为‘名人’,且列入这本书中,实在不配,深感不安。幸所记事实,尚无太大差错,也就搁在一边,待有空再读其中各文。……岁尾年头,偏又以低效率赶履行几项文字承诺,所以接书也就没有即复道谢,请谅。”

也是在这封信中,卞之琳还谈起了自己近年来的生活状况,他写道:“年迈体弱,一年来仅两次出门活动,一次在去年二月下旬闻冯至病危前往医院探看,另一次九月间往艾青家会美国来的叶维廉。去年二月一日,照平时惯例以亲自上下四楼至传达室取邮件,作为锻炼,取晚报回来,在二、三层之间摔伤,幸仅破及颅骨外皮,缝了五针,一周后也就没有事了。但家里人再不让我下楼了……”在信的结尾,他又写道:

我倒想起你前些年出版过一本现代几个写诗的作品赏析集子,我是保存的,只是一时忘记堆藏在什么地方了。不记得其中有无谈我《断章》一诗的,我正帮助友人收集关于此四行短诗的妙解、歪解、乱解的材料,如有便请抄录你自己的几句话,就要发表过的,不要现在新写,寄我备用为感。

每读此信,在我的眼前便会呈现一位白发苍苍的戴眼镜的长者,迈着细碎的步伐,微颤着身子在房间里拿书取报,或伏案写作,或娓娓而谈……现在,这位老人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断章》《圆宝盒》却留存了下来,而且,恐怕是会永远留传下去的。

(上接第一版)

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于穷途

周而复先生在写作《长城万里图》的过程中曾经遭遇了一次不寻常的挫折——1985年访日期间为采集素材而进行的一次参访活动,在当时一些复杂的情况下成为了“事件”,受到被开除党籍的处分。前一次的访谈中我已了解相关情况,2001年的这次晤叙,我们得知老先生最近上送了新的申诉材料。“我对最后解决问题始终抱有信心”,周先生沉静而坚定地说,同时顺手从一边的桌上拿来这套小说中的一本,翻到有关章节,指点一些文字让我们看——内中有一些很具体的记述,例如那个所在供奉的牌位,有一个是侵华战犯东条英机的,而另一处则有其父东条英教的牌位,说明这一对小子老子都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作家写抗日小说,希望尽可能多地采集和掌握素材,这些细节正是在那样的采集活动中获得的。

老作家用自己的认识观、历史观创作的这部作品,自然必须接受时间和读者的

长久检验,但著作者以热忱的爱国情怀、坚强的使命意识完成这么一部大书,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为难得的是,在遭遇挫折,承受不一般的压力和精神煎熬的状况下,周先生“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于穷途”,按既定目标辛勤劳作,最终写完了这部超长篇的最后一句话。这种对事业对理想无限忠诚的定力,和永在征途的战斗姿态,令人感佩不已。

那次叙谈中周先生说的两段话也令人难忘,原话是:“我今年87岁,好心人劝我完成这部长篇后可以搁笔休息了,我自己可不这样想,只要活下去,就还要写作。”“人家以为我写了这么多东西,一定有个好身体,其实不对,我过去生过膀胱癌,后来又有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很折磨人的,有时候心情也会烦躁,但我不悲观,也不消极。”

心系社稷,笔随时代

出生于1914年的周而复自幼承受严格庭训,在之后的求学过程中接触大量传统诗文和中外名著,逐渐对文字和文学滋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世纪30年代以一部

《夜行集》诗集初涉文坛,后来在南京和上海写了好多杂文类作品(出版过一本《北望楼杂文》)。1938年,怀着对战乱年代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急切关注,周而复奔赴延安,曾到晋察冀民主根据地工作四年,然后再回延安。军内军外,关内关外,笔和枪都是战士手中的武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按“双十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周而复受命以新华社和新华社日报特派员的身份,跟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赴各地巡视,了解军调工作,采写军调新闻,先后写出并发表了《晋察冀行》《东北横断面》《松花江上的风云》等纪实作品。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则完成了抗日题材长篇小说《燕宿崖》和《白求恩大夫》的创作。心系社稷,笔随时代,是这一代文艺家内心的自觉要求。对于这场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民族奋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伟大战争,周而复一直有一个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写一部大书的心愿,并多方搜集积累素材,皆因公务繁忙而延搁下来,直到下定决心开笔的时候,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2002年,中纪委经过复查核对,作出了恢复周而复党籍的决定,周老在收到这

个文件的时候感慨万分。而在此后直至生命终点的一年多时间里,高龄老人争分夺秒地进行着最后一部著作《往事回首录》(三卷本100万字)的写作,中国工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岚热忱地帮助这位病弱老人完成了最后的文字。当我接到由刘岚女士寄来的这套图书时,周老先生已不在人世。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2008年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养期间,有一天去鸽子窝公园,王蒙先生与大家同行,其间说到作家高产的话题。王蒙说逆境高产当然好,而遭遇逆境仍然高产,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得到的。他说的正是自己十分熟悉的前辈作家周而复。他说周老先生著作等身,十几年在低谷中负重而行坚持完成既定任务,是何等的力量支撑啊,特别令人钦佩。

自15岁发表第一篇文章到2004年1月8日与世长辞,这位文学长路上的跋涉者为社会奉献了1000万字的著述,多部优秀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的“业余作家”用毕生的心血,书写着他对养育自己的故国热土和人民的深沉的爱。